

析胡方平、熊禾融通先天八卦与《河图》之法

邓小伟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收稿日期：2022年7月12日；录用日期：2022年8月25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2日

摘要

朱子对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的论说体现在“则图画卦”之理中，但所论稍逊周详。后学胡方平、熊禾接续对卦、图关系之探讨。胡氏细解朱子“析合补空”之义，依循特定理路，将卦、图合而为一；熊氏则巧借朱子交易之说，以“阴阳相交”统贯于卦画阴阳与《河图》之数的分置对照中。经由对“西南易位”的各样开解，二儒大抵实现卦、图内在理路之融通。二儒之论瑕瑜互见，若置于元初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下，其意义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关键词

先天八卦，《河图》，“则图画卦”，“西南易位”

An Analysis on Method of Integrating the Primordial Eight Trigrams and *He Tu* of Hu Fangping and Xiong He

Xiaowei Deng

Confucius Cultural Institut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Received: Jul. 12th, 2022; accepted: Aug. 25th, 2022; published: Sep. 2nd, 2022

Abstract

Zhu Xi's the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mordial eight trigrams and *He Tu* was embodied in the theory of "drawing trigrams by imitating Tu", but his theory was a little less detailed. Hu Fangping and Xiong He continu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xagrams and "Tu". Hu Fangping carefully explained Zhu Xi's theory of "separating and filling", and combined hexagram and "Tu" into one according to a specific logical path. Xiong He, with the help of Zhu Zi's theory of interchangeability, used the "intersection of Yin and Yang" running through the contrast between Yin and Yang in the hexagrams and the number of *He Tu*. Through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south and west

translocation”, the two scholars roughly realized the harmony of hexagrams and “Tu” based on internal logic. The theory of the two scholars has both strong and weak points, its significance should be viewed in two ways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early Yuan Dynasty.

Keywords

The Primordial Eight Trigrams, *He Tu*, “Drawing Trigrams by Simitating Tu”, “West and South Transloc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画卦作《易》之由这一易学本根性问题上，宋代易家多以《大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为主要文献依据，深信《河图》中自然蕴含画卦之理，天地只是借圣人之手将此理自然地呈现出来，故倡言圣人乃“则图画卦”。宋人对“则图画卦”之理的探讨，实质是为了证明先天八卦与《河图》内在理路具有相通性、一致性。在《易学启蒙》中，围绕卦、图关系，朱子以“则图画卦”之理示人，但其“析合补空”之说理路剖析尚欠周详，以致遗惑于后学。

李秋丽认为，元代易学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对程朱易学尤其是朱子易学的不同诠释^[1]。对于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的探讨，元儒无论持“河十洛九”观者抑或“河九洛十”观者，都曾提出过或详或略的说解。就河十洛九一派而言，解说较详者有胡方平、熊禾、王申子等人，本文主要以胡、熊二儒为考察对象。胡方平(?~1289)，字师鲁，号玉斋，婺源梅田人。熊禾(1247~1312)，字位辛，一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福建建宁府人。二儒之学根柢于朱子一脉，置身宋元世变之际，以其遁隐心态与致思精神，缀补圣学，《易学启蒙通释》(以下简称“《通释》”)《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以下简称“《图传通义》”)分别为二儒易学体系建构集大成之作。二人接续朱子关于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之探讨，大体实现卦画阴阳与《河图》数理之融通，发朱子之蕴、广朱子之学。

2. 朱子遗留“析合补空”之惑

在朱子的易学世界中，图书之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图》《洛书》对朱子的意义，不惟是其象数思想建立的基础，大而言之，更是朱子以自然哲学、人生哲学、道德观为内核的哲学体系建构的基石。¹《大传》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对于圣人所“则”，自孔安国至邵雍，多以画卦作《易》之事观解，朱子亦不外乎是。朱子尝云：“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2]。他对图、书的识鉴，立足于历史考据与哲学义理，从“史事”和“实理”上明确了图、书的自然性、真实性乃颠扑不破之论。此外，更著《易学启蒙》(以下简称“《启蒙》”)，于首篇极力表章图、书衍生天地万物、穷尽阴阳消长之理的至精、至变之妙用。

朱子初作《启蒙》时，对此书颇为自喜，“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外此则不必知也”^[3]。《启蒙》综罗众家之长，论象数确有精新独到之处，惜为梗概之书，言语稍逊周密。如论先天八卦与《河图》之间的联系时，朱子在《易学启蒙·本图书》中试图融通河洛之学与先天之学，

¹余敦康认为：“在朱熹的易学思想中，《河图》《洛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他的一整套象数之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石。”参见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陈超从自然哲学、人生哲学、道德观阐述了《河图》《洛书》对朱子哲学体系产生的影响。参见陈超：《河图、洛书与朱熹哲学》，载《周易研究》1995年第4期。

认为可由《河图》推导出先天八卦，其过程是这样的：“《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 [2]。由太极至四象逻辑尚属清晰畅通，至四象生八卦一环忽而成之，不免令人心生疑惑。元人王申子对朱子“析合补空”之说有过一段疑问：“谓‘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坎、离’，不知如何析其合以为坎、离于西、东，而其位不可易。谓‘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不知如何惟兑可以补东南，惟艮可以补西北，而他卦不可补” [4]。王氏之惑，亦是后世之疑，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如何“析”“补”方能造成先天八卦与《河图》位、数的形态黏合，此关涉“象”之层面；其二，“析合补空”后，卦、数之间的对应如何体现合理性，即此数与此卦对应之理路为何，直指“理”之剖析。在《易学启蒙·原卦画》中朱子依旧采借先天卦画与《河图》数字简单对照的方式说明生卦次第，但依旧未能阐明《河图》如何生出先天八卦。朱子之失，在于对直观之“象”与内在之“理”缺乏具体而微的分析，这项任务其实留给了朱子后学，此议题在后学多方诠释下内涵不断丰富。

3. 胡方平对“则图画卦”之理的深入解析

胡方平曾受学于朱子高足黄榦之弟子董梦程，是为朱子的三传弟子。其所著《易学启蒙通释》，肯认图、书为画卦作《易》之源，并绍绪朱子“河十洛九”之说。胡方平之世，“诚以去朱子才百余年，而承学浸失其真。如图、书已厘正矣，复承刘牧之谬者有之” [5]。故维护朱子易图学成为当务之急。元初朱子后学往往通过探讨朱子《河图》《洛书》的本原形态或者从《河图》《洛书》中推导出八卦卦象来证明朱子《河图》《洛书》形制的合理性。胡方平正是借接续朱子“则图画卦”之理的诠释来维护朱子易学的。

在论及具体的画卦原理时，胡方平采用的是“以卦配数”的方式。胡方平指出，“圣人则《河图》也，亦因横图卦画之成以发圆图卦气之运耳” [6]。其对“则图画卦”过程的分析，是以横图生成为逻辑起点的，最终落脚于圆图展开及卦、图相配。在这一过程中，胡氏将《河图》之数与先天方圆图相融合，试图实现图书之学与先天之学之融通。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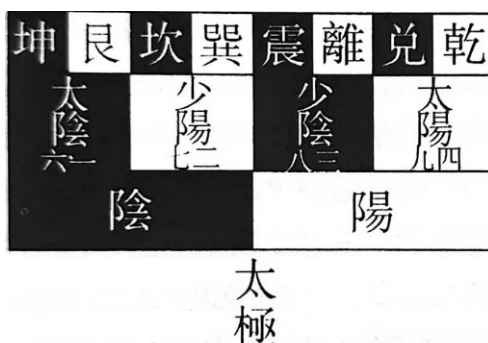


Figure 1. Chart of Fu Xi drawing trigrams by imitating He Tu (its one)
图 1. 伏羲则《河图》作易图(其一)

如图所示，胡氏先天八卦生成之序，是由太极之“一”以加一倍之法化生阴阳，继而以卦画叠加的方式而生四象以至八卦、六十四卦，不离邵子先天之学与朱子的“一每生二”之义。朱子以一、二、三、四为分别为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之位，六、七、八、九分别为为太阴、少阳、少阴、太阳之数。胡氏则从朱子“四象者，《河图》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 [3]汲取慧识，对“则图画卦”过程中图、卦的四象之数对应关系作出适当调整。胡氏以先天四象各配以《河图》之生成数，凡言先天四象之于《河图》，则以太阳配四九、少阴配三八、少阳配二七、太阴配一六，以此模糊位、数之界限，

以数统位。如此，其实已符示了先天四象与《河图》相通之可能性。

朱子“则图画卦”说既因“析合补空”语焉不详而遗惑于后世，故胡氏在“以卦配图”时，则主要从“析合补空”字意诠释与操作路向入手，将先天八卦与《河图》统合观之，并绘制新图，以提供直观性的象数诠解。见图2。胡氏认为，“析合补空”的具体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析二、七之合，则七居南为乾，而二补东南隅之空以为兑；析三、八之合，则八居东为离，而三补东北隅之空以为震；析四、九之合，则九居西为坎，而四补西南隅之空以为巽；析一、六之合，则六居北为坤，而一补西北隅之空以为艮者。此则之以成八卦也。[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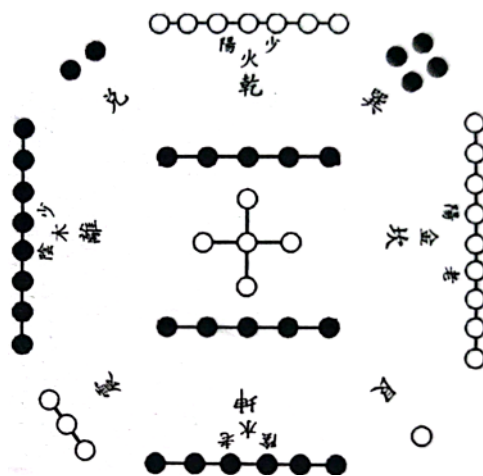


Figure 2. Chart of Fu Xi drawing trigrams by imitating He Tu (its two)
图2. 伏羲则《河图》作易图(其二)

《河图》中，二合七居南、三合八居东、四合九居西、一合六居北，皆处四正之位。由图1可知，乾、兑生于太阳之四九，离、震生于少阴之三八，巽、坎生于少阳之二七，艮、坤生于少阴之一六。依胡氏“析合补空”之解说，以先天八卦配《河图》数、位，则七、八、九、六之数，分别配以乾、离、坎、坤四卦，居于四正。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维则分别“补”以所“析”之二、三、四、一，分别为兑、震、巽、艮四卦。如此则形成图2所示的卦、图浑然一体、规整有序的新图式。但若从四象之数的角度以图1比照图2，可见由太阳四九所生之乾、兑与少阳二七所生之巽、坎在卦位上发生了互换，笔者称之为“西南易位”。

朱子象数易学内部“西南易位”问题及其说解，其实导源于朱子《启蒙》所论及的“三同二异”的命题。所谓的“三同二异”，指《河图》主常为体，中五内含五生数之象，《洛书》主变为用，中五涵具五奇数之象。一、三、五同而二四、七九位数相异。以位观之，《河图》中五之数二、四分处南、西，《洛书》中五之数七、九却分居西、南，故《河图》《洛书》由常至变或由变至常，则有“西南易位”之象。此规律朱子概括为：“盖阳不可易而阴可易，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也”[2]。“阳不可易”者，一、三、五也，“阴可易”者，二、四也。七、九虽属阳，却由二、四得五而来，仍从属“可易”之范畴，故言“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也”。朱子从数之阴阳属性角度立论，释“三同二异”，为《河图》《洛书》西、南之位数在由方至圆或由圆至方的转换过程中确立了“可易”之基调。

若说朱子只是将“三同二异”限制在《河图》生数、《洛书》奇数一隅，胡氏则根据《启蒙》所言《河图》五生数统五成数、《洛书》五奇数统四偶数之义将“三同二异”涵摄之数扩展至图、书之全数。按胡氏的观点：“图、书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东，五皆在中，三者之位皆同也。图之二七在南，

而书则二七在西，图之四九在西，而书则四九在南，二者之位皆异也”[6]。依此理，按胡氏先天四象各配以《河图》生成数之法互观卦、图，则同样会出现“三同二异”的现象，亦即是“西南易位”，这是由先天八卦圆图与《洛书》的外在形态相似与内在数理黏合所决定的。胡氏对“则图画卦”过程中所出现“西南易位”现象是这样解释的：

盖《河图》二象之居于东北者，阴之老少也，阴主静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不能他有所兼……《河图》二象之居于西南者阳之老少也，阳主动而通其变，故金火互通其象，实能两有所兼。[6]

此处，胡氏从阴阳动静及五行属性的角度解释老阳、少阳“西南易位”的问题。按胡氏“三同二异”之说，阴之老少为六、八，二数统属于生数一、三，故不可易；老阳九、少阳七统属于生数四、九，故可易。正如李滉所言，胡氏此处释“三同二异”与朱子的不同之处在于，“盖朱子主生数而言，胡氏主成数而言”[7]，意即二人互有侧重。《河图》东北之老阴、少阴所具的静与常之特性亦赋予其所属之水、木二行。阳大阴小，阴气往往承阳而动，未知变通，故在老阴则水、少阴则木，二者不可互通，其对应之卦各居本数之位。老阳、少阳则涵动与变的因子，往往伺机而动、穷变知通。图2老阳之乾居于南方火位，少阳之坎西方金位，《说卦》言乾为金、坎为赤，所以胡氏认为金、火其象可通，故其所属之卦位置可易。

胡氏对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的讨论，以接续朱子“则图画卦”理路之诠释而展开，通过对“析合补空”之说的深入解读，以先天四象各配《河图》之生成数，将图、卦合而为一，“探索发展了《河图》之数与先天八卦之间的关系，很显然是对朱熹易学的发展与完善”[7]，大抵也能自圆其说。元代以降，学者对胡氏《通释》及其“则图画卦”理路的评价褒贬不一。明人杨士奇称赞道：“朱子《易学启蒙》，惟胡方平本最善”[8]。肯定其系统注释《启蒙》，传续朱子心意的扶掖之功。蔡清在其著《易经蒙引》释“析合补空”一节时沿用胡氏说解。元代学者鲍宁则指斥胡氏“西南易位”之说“拘拘于求合，非法象之自然，故有窒塞而难通”[9]。认为胡氏牵强比附，已经违背朱子本意。朝鲜李滉则现在中间立场，对鲍宁批评胡方平之语作出表态，认为胡氏之说“虽非朱子本意，亦可备一说，而非附会无据”[7]。清人方孝标则指责胡方平混淆《河图》四象位、数，完全偏离朱子之遗教。尽管胡氏对“西南易位”问题做出巧妙的化解，但这一问题其实也暴露出《河图》之数与先天八卦之间逻辑的天然非一致性。

4. 熊禾以“阴阳相交”之法贯通卦、图

熊禾易学上承蔡渊(朱子门人)、徐几(蔡渊门人，熊禾之师)，算来亦是朱子三传弟子。熊禾对卦、图关系的探索，就其动力因来看，是当时部分学者“以先天圆图四象之位合《洛书》不合《河图》，复墨守刘牧之说”[10]。因此，证明先天圆图四象之位合《河图》，从而维护朱子图书之学，成为熊禾的首要任务。《图传通义》一书中，熊氏论及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时，在继承朱子遗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思路。

熊禾进一步发扬了朱子的易道阴阳思想，其释横图八卦生成、《河图》之象数，首重阴阳之交。他认为：“易，交易也，变易也，非交固不能变也”[10]。“交”是先天阴阳的升降，“变”是后天阴阳的流行，卦则“交”而后“变”。这种“阴阳相交”的诠释进路，也贯穿在他对卦、图关系的考察过程。关于易有太极，熊氏与朱子并无二致。自两仪生四象始，熊氏的阴阳相交观逐渐凸显。朱子以“博易”“交易”论“易”，故在朱子的易学理域中，卦画之生成，就其普遍性称谓乃曰“生”或“交”，即《启蒙》所引邵子的“阳上交于阴，引下交于阳，而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2]。熊氏论阴阳交易不仅重视其在先天卦画生成过程中的前后一贯，亦创造性地将《河图》位、数相交纳入先天卦画交易体系中，与卦画生成分置而观，使先天卦画与《河图》的关系一目了然。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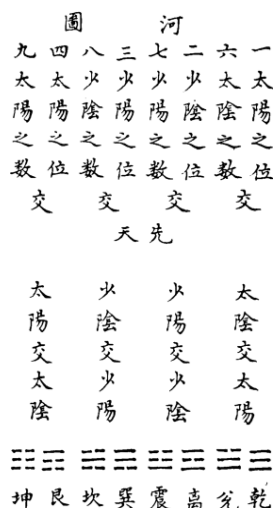


Figure 3. Chart of He Tu's numbers matching four emblematic symbols produced the eight trigrams
图 3. 《河图》数配四象生八卦图²

依熊氏之意，先天四象与《河图》四象各自的内部交易是存在对应机制的，卦、图相通之理路是建立在“交”的基础上的。由图检视，《河图》四、九居西，太阴之位交太阳之数，先天则太阴交太阳而生乾、兑，余下诸卦之生皆仿此。从先天之学来看，这种四象相交的生卦模式，可以直接推导出先天横图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八卦次序。以《河图》观之，则是五行的生成过程。横图中分展开，是为圆图。关于先天八卦与《河图》的配对问题，熊氏表达了自己异于前人的观点，并绘有先天圆图配《河图》之图式。见图 4。熊氏认为：

中间太极，即是虚五与十。先天圆图第一画左一阳右一阴即是一与二，第二画阴阳之交即是一二三四，第三画阴阳老少之交即是一二三四交七八九六，其序皆自内而外，无有不同。但《河图》四象之交相依而同居其方，先天四象之交相对而各居其所。[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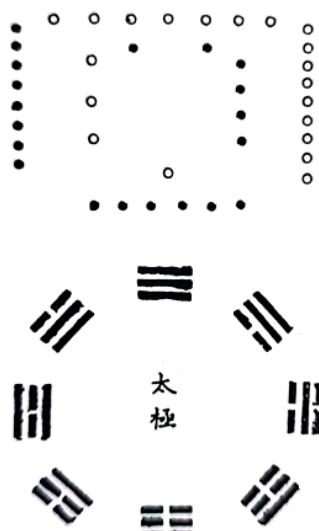


Figure 4. Chart of prenatal round diagram matching He Tu
图 4. 先天圆图配《河图》图

² “四太阳之位”中“阳”字误，应为“阴”。《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为抄本，或为抄写错误。

胡方平论卦、图关系，是采取先天八卦与《河图》浑然一体的形式，熊氏巧设卦、图分置之法，以八卦、《河图》分置互观的形式，从先天八卦第一画始，探寻二者的内在象数理路。熊氏认为八卦、《河图》的对应是先天卦画一画至三画之象与《河图》之数的隐契，即先天阴阳、阴阳老少、八卦与《河图》阴阳、四象之数、四象位数之间的暗合，而“交”近乎贯穿整个过程。可以说，“交”与是熊氏实现先天八卦与《河图》贯通的主体性媒介，非“交”无以生卦，非“交”无以统卦、图。既然生卦过程存在对应，按此理，是否成卦之后亦存卦、数对应？笔者认为，胡氏此处论说之重，集中于四象阴阳之交，意在说明卦画可由先天四象与《河图》位、数相交而来，其所绘之图，更多的是对先天圆图与《河图》内在理路的揭举，故并没有像胡方平那样混淆《河图》位数，将八卦置于《河图》内作硬性的配对。

其实熊禾的先天四象与《河图》生成数的对应与胡方平并无差异，只不过为四象阴阳相交的提法所遮蔽而已。故以熊氏相交之法，就象、数方位视之，先天阳之老少与《河图》阳之老少同样会出现“西南易位”的情况，这是时人所谓的先天圆图四象之数、位合《洛书》不合《河图》的症结所在。对此，熊禾解释道：

《河图》一六交而为七，二七交而为九，九与七老阳少阳之数也。其交也，成老阳少阳之数而不成老阴少阴，所以先天圆图视《河图》老阳少阳则相交，而老阴少阴不交也。然则《河图》之七已自变而为九，先天妙处正自相吻合。^[10]

熊氏释“西南易位”，亦参之以“交”之义。首先，从阴阳交变的角度看。如前论熊氏所言，《河图》乃常变之统一体，交是变的基础，变是交的结果。当交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数的性质则发生变化。如一、六交则六变为七，二七交则七变为九。《河图》位、数之交，只成老阳、少阳，而不成老阴、少阴，说明阳之老少自有其特殊性。其次，以阴阳动静的视域言，阳主动，阴主静，阳者通其变，阴者守其常，这点与胡氏相类。《河图》中，老阳、少阳动而太阴、少阴静，动则进，静则守常，故七可进变为九，九极则退变于七位，八、六恒而不动。七至九，九至七，是一个自变、互迁的循环过程，遵循知极而退的向度。

熊氏“说法在本质上与胡方平以数配卦之说，实际并无差异”^[11]，就证成理路而言，自有其新意，大抵亦能实现卦、图之融通，且能体现出先天阴阳、《河图》数位相交而生八卦之义。但从卦、图二者理与象之黏合效果看来，似乎不及胡方平。时人曾质疑熊氏论先天八卦与《河图》异于《启蒙》“析合补空”之说，熊氏则自解道：“‘析合补空’，《启蒙》论圆图也，余之说论横图也。况余论横图，皆不过即朱子之蒙以补《启蒙》中之所未言耳，非敢求异于朱子也”^[10]。熊氏严格区分《河图》位、数之阴阳属性以及阴阳交易思想，确是“即朱子之蒙”，但其何尝不论圆图？其论圆图确与朱子“析合补空”无涉，这或许正是其说不为人所知的钤键所在，其《河图》位、数相交之法以及脱离“析合补空”之说的卦、图之分立、模糊对应，虽皆朱子所未言，但在元代朱子易学独尊话语体系下，这种过度发明往往显得大胆而无根，其湮没于后学视野亦属情理之中。当然，对卦、图关系的探索，本身就是多元开放的，熊氏之法虽偏离朱子本意，但并非全无理，适可备为一说。

5. 结语

胡方平、熊禾对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的探讨，于朱子易学而言，非止于补苴罅漏，亦有张皇幽眇处。二人都是在继承朱子“穷理”精神的基础上，将画卦、布卦过程分解为先天横图和先天圆图两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继而通过对八卦、《河图》内在数理分析以及脱胎于“三同二异”说的“西南易位”自洽性开解，探寻二者契合所在，以补朱子“析合补空”未明晓、欠圆融处。胡方平重构“析合补空”之说，以先天四象各配《河图》之生成数，在变动图式的基础上将卦、图合而观之，其卦、图对应相对直观、有序，使人一目了然。熊禾则越过“析合补空”说，尊重《启蒙》中《河图》的既定图式，其“以

卦配数”之义通过由太极至八卦统摄性的“阴阳相交”之法最终以八卦、《河图》分置互观却理路暗合的形式呈现。就诠释进路而言，二者宗朱与创新并行不悖，虽有不足，但大体亦能自圆其说，是时代反思的凸显与圆融朱说的实践，从朱子易学内部演进、多元面向处着眼，洵有补益。

以今人视角观之，正如朱伯崑所言：“卦象同河洛之数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12]。张克宾亦言：“从《河图》《洛书》的数目形式推演出卦爻画和《洪范》九畴，乃是‘过度诠释’，两者意义难以圆满黏合”[13]。就直观之“象”而言，八卦与《河图》在形态、位数上天然地具有不可重合性，由数字推出卦爻画，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行为，难免带有穿凿附会之意味。当然，对卦、图关系孜孜不倦的探寻，是朱子一脉建构其易学发生论的前提，亦是易家由人道逆推天道，穷理尽性之自觉，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自有其重要的形上学意涵，其重要成就就在于为当时开辟和拓展数百年的易学奠定基础”[14]。所以，我们似乎也无需站在今人的视野下苛责古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易图集成与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2018VJX003)。

参考文献

- [1] 李秋丽. 元代易学史[M]. 济南: 齐鲁书社, 2020: 5+174.
- [2] 朱熹. 撰. 易学启蒙[M]//朱子全书: 第1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211+214+215+238.
- [3] 朱熹. 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 第21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637+1683.
- [4] 王申子. 撰. 大易辑说[M]//易图文献选辑(第1辑): 第18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20: 168-169.
- [5] 胡一桂. 周易启蒙翼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22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00.
- [6] 胡方平. 易学启蒙通释[M]. 谷继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64-65+58.
- [7] 李滉. 撰. 启蒙传疑[M]//易图文献选辑(第3辑): 第30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20: 395+410.
- [8] 杨士奇. 东里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238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79.
- [9] 鲍云龙. 天原发微[M]//易图文献选辑(第3辑): 第25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20: 333.
- [10] 熊禾. 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M]//续修四库全书: 第2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46+450+451.
- [11] 谢辉. 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249.
- [12]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5: 441.
- [13] 张克宾. 朱熹易学思想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0: 114.
- [14] 吴宁. 朱熹论画卦原理[J]. 现代哲学, 2019(4): 123-129.